



中国适龄劳动人口萎缩已成定局，并将对中国乃至全球其他国家造成重大影响

中国安徽省淮北市的纺织工人。

米塔利·达斯、帕帕·恩迪亚耶

一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依靠的是其充足的廉价劳动力资源。而当前，工资水平飙升，同时，工人的激进行为及用工荒时有发生。这些迹象都表明，中国即将进入一个劳动力普遍短缺的时期。

中国正在从一个拥有丰富廉价劳动力资源的经济体转变为一个用工成本较高的经济体，这对中国乃至全球经济都会造成深远影响。

由于中国的粗放型增长模式高度依赖于产业工人数量的增加（要素投入累积），因而，这一转变可能表明该模式将无以为继。因此，这个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可能会向资源利用效率更高的集约型增长模型转变，并将投资拉动型增长方式调整为个人消费拉动型增长方式。如果中国的经济调整取得成功，将对全球经济产生重大的积极影响。商品出口国产量将会增加，同时，目前作为中国供应链组成部分的区域经济体的产量也将增加，甚至发达经济体也将受益（IMF, 2011年）。重要的是，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将影响中国的价格、收入以及企业利润，并将对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就业及价格走势造成影响。比方说，外国制造商可能会发现，在中国生产越来越难以赢利，从而会增加其国内就业；中国商品将失去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优势，从而可能导致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出口份额增加；中国商品价格

的上涨可能会转嫁到高度依赖中国出口的贸易伙伴身上。

廉价劳动力的未来

中国劳动力市场的最新发展趋势似乎有些矛盾。一方面，在过去10年间，工资总额增长率始终保持在

“刘易斯拐点”

在阿瑟·刘易斯爵士（Sir Arthur Lewis）的学术著作（1954年）中，发展中经济体以这样两个行业为特征：一个是劳动生产率较低、劳动力过剩的行业（如中国的农业），另一个是劳动生产率较高的行业（如中国的制造业）。劳动生产率较高的行业盈利水平较高，部分原因是因为它可以雇佣到廉价的剩余劳动力，而这些剩余劳动力是由于劳动生产率较低的行业工资水平普遍很低而产生的。因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快于工资的增长，因此，在就业不充分的经济形势下，劳动生产率较高的行业获得的利润比充分就业时更多。这也促使资本形成的规模不断扩大，推动了经济增长。然而，随着剩余劳动力人口的萎缩，劳动生产率较高的行业开始提高工资水平，因此，利润空间受到挤压，投资减少。此时，我们称该经济体穿过了“刘易斯拐点”。

廉价劳动力的 终结

15%左右，企业利润率也处于较高水平。工资的增长落后于劳动生产率，导致利润仍在上升，这表明中国还未达到所谓的“刘易斯拐点”（见专栏）。“刘易斯拐点”是指一个经济体的劳动力资源由过剩转向短缺的转折点。但同时，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产业布局逐渐从沿海向内地转移，而大量农村劳动力均在内地。因此，拥有城市户口的城市劳动力的巨大供求缺口虽在逐渐缩小，但工人不断要求提高工资并改善工作条件，这表明，中国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紧缺已经出现。

另一方面，人口结构变化趋势是很明确的。这预示着，中国将向劳动力资源短缺型经济转变。联合国预计，人口老龄化及生育率下降将导致未来10年间适龄劳动人口（15—64岁）不断萎缩（见图1）。产业工人的主体（25—39岁，在实施计划生育政策（即一对夫妻只准生一个孩子）以后出生的人）萎缩速度甚至更快，人口迅速老龄化将改变半个多世纪以来抚养比率的下降趋势。抚养比率是指15岁以下及64岁以上的人口与适龄劳动人口的比率（见图2）。

即将到来的人口结构的巨大变化是不可逆转和不可避免的，并将决定中国未来剩余劳动力的发展趋势。但是，还有一些因素可能会减缓或者加速这一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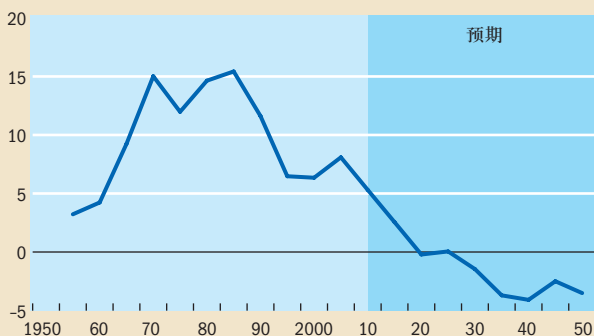
即将到来的人口结构的巨大变化是不可逆转和不可避免的。

程。户籍制度（证明某人属于某地）的进一步改革——即所谓的户籍改革，可以加速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转移的进程。为满足个别岗位的技能要求，开展针对劳动者的培训，这样可以解除城市劳动力所面临的瓶颈。提高生育率有望延缓剩余劳动力的缩减速度，但是这需要一代人时间。尽管中国的第一产业（农业、采矿业及其他与自然资源相关的生产活动）拥有近1/3的劳动力资源，但2011年农业附加值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图1
萎缩的劳动力人口

中国的适龄劳动人口（15—64岁）增速已经减缓，并将在2020年左右出现负增长。

（中国的适龄劳动人口增长，百分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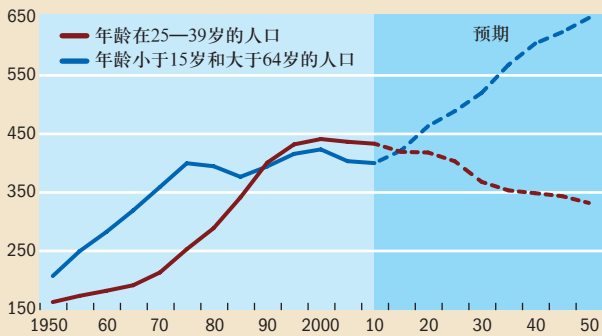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联合国。

图2
人口压力

中国产业工人的主体（25—39岁）正在萎缩，而非适龄劳动人口正在增长。

（百万人）



资料来源：联合国；IMF工作人员的预测。

1/10。通过将农业机械化程度提高到类似国家的水平，提高农业生产率可以释放农村劳动力资源，弥补城市劳动力需求的不足。通过实施这些政策，中国能够争取到一些时间。但问题是能争取到多少时间。

拐点的出现

据我们的估计，中国在过去2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处于劳动力供给过剩的状态，包括失业和未充分就业劳动力（见图3）。尽管自1992年起，新增就业岗位有数千万之多，而且10年前的新增就业岗位更是难以计数，但剩余劳动力人数却始终居高不下。2000年以前，剩余劳动力呈逐渐上升的趋势，2000年到2004年间，剩余劳动力猛增，这主要与国企改革造成大批人员下岗有关。此后，随着适龄劳动人口增长稳步放缓以及沿海工业城市快速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旺盛，失业和未充分就业劳动力有所减少。但随着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就业形势再度出现逆转。2009—2010年间，对中国劳动力的需求不断下降，剩余劳动力人数骤增。我们估计，那两年期间，剩余劳动力人口在1.5亿左右。

即便如此，根据人口统计数据，几乎可以肯定，中国在2025年以前定会穿过“刘易斯拐点”。

我们的基线情形预测了剩余劳动力可能的发展趋势，并假设市场条件（会对贸易伙伴及其他经济体的失业率、实际工资调整、全要素生产率和GDP增长造成影响的市场条件）和人口结构均保持当前趋势。这种情形还假设，现有的社会和经济政策保持不变，如

户籍改革、计划生育政策（城市夫妇只准生一个孩子）及金融改革（允许市场调节利率）。目前，官方设定的存款利率上限低于贷款利率下限。

通过基线情形可以看出，中国的剩余劳动力人口在2010年已经达到顶峰，并即将面临大幅萎缩：将从2010年的1.51亿下降到2015年的5700万，再下降到2020年的3300万。预计中国将在2020—2025年间到达“刘易斯拐点”，也就是说，在这五年间的某一时间点，中国劳动力需求将超过供给。剩余劳动力的锐减速度与预期抚养比率走势密切相关。2010年，抚养比率达到历史最低点，预计此后会迅速上升。

尚未成定局

然而，可想而知，人口结构的巨大变化、社会需求的不断增加以及外部环境的不断变化，都可能促使中国政府转变政策，而市场对此做出的反应会使经济结构发生改变。

譬如说，由于预计劳动力市场将出现紧张局面，生产型企业可能会决定加紧向资本密集型生产方式转变。同时，中国政府可能会加快户籍改革进程，从而进一步推进社会保险和养老保障计划。目前，不在户口所在地工作的劳动力无法自动享受退休金和医疗保障等一系列待遇，这种现状阻碍了农民工进城务工。

事实上，提高城镇化水平、改善收入分配及工业技术结构的一系列举措已被列入“十二五规划”（于2011年通过），这些举措可以通过改变劳动力供给或需求，推迟“刘易斯拐点”的出现。比如，向资本密集型生产方式转变，可以减少劳动力需求。

此类政策可以延缓中国将向劳动力短缺型经济转变的进程。另一方面，一些旨在改善民生的政策措施也可能会意外地加剧劳动力紧缺的局面，不过，只有在中国的储户和劳动者得到了更多回报的情况下，才会出现这种结果。还有很多种其他可行的情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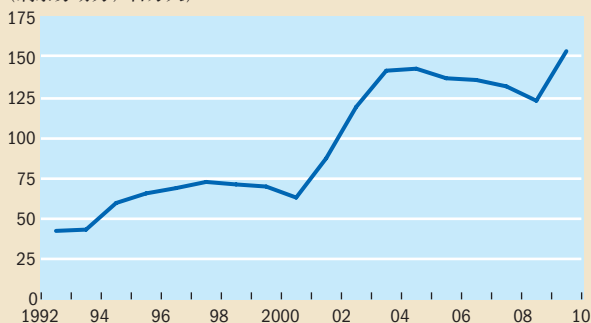
放宽独生子女政策：2010年，中国平均每位女性的生育率为1.6，这使得中国成为当时世界上生育率最低的国家之一，远低于亚洲新兴经济体的生育水平。放宽独生子女政策，将生育率提高到联合国高生育率人口预测的水平，可以推迟中国从基线到达拐点的时间。但是，影响可能不会太大：到2020年，剩余劳动力人口将从基线所预期的3300万增加到3600万；到2025年，劳动力缺口将为1600万，而基线预期为2700万人。然而，中国经济仍将在2020—2025年间出现拐点。这一结果不足为奇：首先，提高生育率增加了潜在的劳动力规模，但这一点会推迟；其次，联合国高生育率指标只是做了适度的调整，将中国的生育率从1.6提升到2.1这一比较接近的替代水平（见图4）。

图3

萎缩的剩余劳动力人口

中国的剩余劳动力人口从2004年开始减少，在2009年和2010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期间骤增，预计即将再度下降。

（剩余劳动力，百万人）



资料来源：作者的计算。

注：剩余劳动力人口包括失业人口（没有工作，但正在积极寻求就业的人口）和未充分就业的人口（有兼职工作，但希望找到全职工作的人口）。

提高就业参与率：与类似国家相比，中国已就业或者正在积极寻求就业的适龄劳动人口比例较高。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经济基础发生变化，这一比例呈下降趋势——从1995年的0.87降低到2010年的0.82。考虑到目前市场更乐于接受年轻劳动力（尤其是进城务工的农民）以及相对较低的退休年龄，因此，这种下降趋势反映了当前年龄较大的劳动力人口所占比例正在上升。提高就业参与率的一个办法是，减轻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的成本。也就是说，加快户籍制度改革，保持人员流动时其利益不受损失。将就业参与率恢复到0.85这个20年前的平均水平，会使劳动力剩余的状况持续到2025年以后，并有可能将“刘易斯拐点”的出现时间向后推迟五年（在2025年至2030年间出现）。这是因为，与生育率不同，提高就业参与率会对潜在劳动力规模产生直接影响，从而影响劳动力供给。

提高就业参与率的一个办法是，减轻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的成本。

金融部门改革：实行利率自由化将会提高存款利率，增加股票的回报率，同时，也会减少资金向股票市场流动。因为提高存款利率更有利于家庭储蓄目标的实现（Nabar, 2011年）。因此，家庭成员的工作意愿将会降低，中国经济将会更快地穿过“刘易斯拐点”。从基线情形中可以看出，到2020年，剩余劳动力人口将在3000万以内。利率自由化可能会造成利率不断上升，使剩余劳动力减少至约1000万。2020年后不久将

出现拐点。

产品市场化改革：产品市场化改革将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总体上讲，对产出变化的影响不能归因于投入的改变）和企业的盈利能力，从而增加对劳动力的需求。过去20年间，全要素生产率（技术进步、创新和教育发展的结果）对中国产出增长的贡献始终是积极的，但最近几年，其增速开始放缓。“十二五规划”期间，应该出台许多能够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政策，包括：促进服务行业的竞争，增加对高附加值产业及创新的投入。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提高到过去20年的平均水平，将影响到“刘易斯拐点”的出现时间，这一点与金融改革很相似。不同的是，金融改革会减少劳动力供给，而与基线情形的预期相比，产品市场化改革会加大对劳动力的需求。

人口结构起主导作用

中国的人口结构即将发生重大变化。几年内，适龄劳动人口将达到历史峰值，然后开始急剧下降。当这种情况发生时，庞大的廉价劳动力人口（近些年来一直是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核心动力）将会消失，经济和社会面貌由此将发生深刻的变革。从根本上来说，预测的“刘易斯拐点”出现的时间点是不确定的，我们设计这些情形的目的是为了展现出能够加速或延缓这一必然趋势的各种变化。但是，中国劳动力结构的变化是不可避免的。在中国向劳动力短缺型经济转变的过程中，人口结构将起到决定性作用，因此，市场和国家的反应，在加速或延缓“刘易斯拐点”出现的时间方面作用不大。■

米塔利·达斯(Mitali Das)是IMF研究部的高级经济学家，帕帕·恩迪亚耶(Papa N' Diaye)是IMF亚太部的副处长。

本文基于作者所著的IMF工作论文13/26, “Chronicle of a Decline Foretold: Has China Reached the Lewis Turning Point?”

参考文献：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 2011,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Spillover Report for the 2011 Article IV Consultation and Selected Issues, IMF Country Report 11/193 (Washington).

Lewis, William Arthur, 1954,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Unlimited Supplies of Labour,” The Manchester School, Vol. 22, pp. 139-9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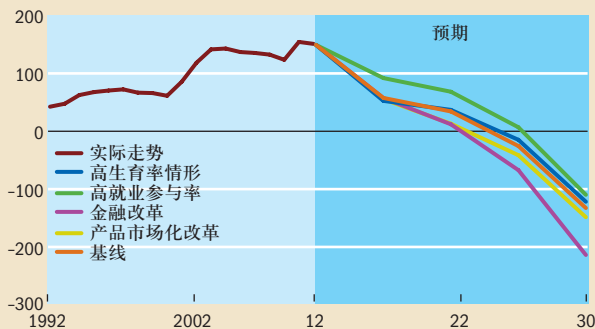
Nabar, Malhar, 2011, “Targets, Interest Rates, and Household Saving in Urban China,” IMF Working Paper 11/223 (Washington: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World Population Database.

图4
剩余劳动力的消失

从任何一种经济或政策的情形可以看出，到2025年，中国的剩余劳动力人口将会消失，劳动力将出现短缺。

(百万人)



资料来源：环亚经济数据公司；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联合国；IMF工作人员的计算。